

六四後中國新聞界的曲筆救國

林瑞琪

中國新聞業的傳統，集合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救國情懷及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使命；但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棍子的政權下，又得向當政者作出相當的合作。但在困難之中，仍努力向人傳達他們心中所確認的真相，令人敬佩。

雖然中共是靠槍桿子取到政權，但無論在掌政之前，或當權至今，都絕不放鬆宣傳工作，且一直強調新聞工作要為人民「革命事業」服務。官方報刊無論大小，均必須與中央口徑一致。因此，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人民日報》說了幾個星期的真

心話，結果當然難逃鎮壓。「六四」一過，《人民日報》立即進行大換班。

不過，中國人有句老話：「公道自在人心」。也許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真的「中了咒」，向來就有不怕死對著幹的精神，雖然鎮壓過後中共的傳媒一派蕭瑟，但陰風陰雨之間仍禁不住露出幾絲陽光。從「六四」後的《人民日報》及《光明日報》看，本著大無畏精神巧妙地向現政權提出抗議者，依然大有人在。當然，新聞機構是控制在槍桿子之下，如何表達自己的信念，就要看新聞工作者的功力了。

批評劉賓雁

「六四」後兩報的多篇文章，都曾以批評民運份子為題，借勢指斥當政者的過咎，並為民運人士打氣。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光明日報》一篇以「劉賓雁反動面目的大暴露」為題的文章，表面上是在批判劉，實質上討伐統治階層。文章說，

劉賓雁頑固地堅持其多年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到了國外，更加肆無忌憚。去年（琪按：即一九八八年，）四月，他在《洛杉磯時報》發表文章，宣揚資產階級的『新聞自由』，要求國內搞『民間辦報』，反對中國共產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新聞體制和指導方針，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爭奪輿論陣地。六月，他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表的『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談話，為香港《百姓》半月刊全文連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宣稱我國社會主義的『民主模式和制度失敗了』，鼓吹要

用『三權分立』的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取而代之，並且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們犯了一個巨大的、戰略上的錯誤，就是要跟資本主義一刀兩斷』，等等。

平心而論，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要走的，正是赤裸裸的資本主義，而且是狄更斯筆下《孤雛淚》所描述的早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好的，可以另立文章討論，但本文作者卻隱隱然有意無意地為劉賓雁打氣。再讀另一段，

去年九月下旬，劉賓雁在哈佛大學講演（原文如此），斷言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有成功的可能』，胡說『中共官僚集團』是中國大陸無法進步的根本原因。……

去年十一月，劉賓雁在波恩接受聯邦德國《世界報》記者採訪，在回答創作自由問題時借題發揮，誣蔑中國『直到今天還是沒有言論自由』，宣稱要通過對中國現行制度的『變

革』，指希望能出現『第二個政黨』。十二月初，他到美國馬里蘭大學對海峽兩岸的留美學生作講演，評論所謂『中共的興亡和中國的前途』。他無視我國十年改革的偉大成果，說改革『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原因是所謂中國『政治制度不合理』，叫嚷要取消作為我國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竟然說『四項基本原則則是中共憲法的前言，沒有法律效力。一切紙上的東西都是可以改變的』。

二十年後，回顧其後兩次修憲，中國政府一直在淡化「四項基本原則」，劉賓雁固然功在國家，而為劉賓雁婉轉傳話的郭帆，也不能說不值得多謝。

劉賓雁的另一些罪狀尚包括，「劉賓雁通過當天《紐約時報》的一篇專訪，責怪美國政府在中國大陸『政治犯』問題上『未如對蘇聯一樣提出抗議』，說『如認為中國的人權無關緊要的話，實是一種侮辱。』更妙的是，文章後部引述劉賓雁說，「有一

百多個高級將領聯名反對（戒嚴）這種錯誤決定……不承認李鵬政權，甚至稱其為偽政府。」

文章當中更有其他多處精彩的摘錄，篇幅所限，還請讀者親自找一找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的《人民日報》，當可全文欣賞。該文在十一月四日《光明日報》全文轉載，相信當時閱讀到該文的人士為數不少。兩報的編採人員同心同德，的確難能可貴。

批評嚴家其

在整個八九年的下半年，這一類文章一直明出暗沒，屢禁不絕。當權者又不能出面否認，結果是有苦自己知。芸芸文章中，最精彩的一篇莫過於八年八月三日在《人民日報》刊出的「動亂『精英』嚴家其」（以下簡稱「批嚴」文章）了。

「批嚴」文章除了開首一段說「一些百命為知識界『精英』其實是中國知識份子敗類的人物……嚴家其是其中一個主要代表人物。」輕描淡寫地勉強「指責」嚴家其幾句外，其他地方完全是替嚴家

其義務宣傳。在文章第一部份中，具體介紹了嚴家其的主體思想。

整篇文章共分四大部份。第一部份列舉嚴家其與「啓蒙社」、「振興社」及《四五報》的關係；第二段則全面介紹嚴家其的著作及論點，表達的詳盡程度，連香港人在選戰中的宣傳也望塵莫及。

『西單牆』和非法組織被取締後，嚴家其著手『研究』政治學。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三本書，一本是由大小字報和各種謠言、傳聞拼湊起來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本是宣揚資產階級政治觀的《首腦論》，還有一本是我吹噓、自我標榜的《思想自傳》。他的基本政治觀點，是主張中國實行不要共產黨領導的『三權分立』，『權力制衡』，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封閉的思想體系』，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就是『保衛中國封建文化』，總之，是要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推銷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

「批嚴」文章進一步宣讀了嚴家其多項榮譽，洋洋大觀。他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的一些人密切配合，互相呼應，成爲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正因爲如此，他被海外內一些人捧爲『新型政治學家』、『政治精英』、『政治體制改革理論權威』和『民主鬥士』、『自由派知識分子代表』、『當代世界名人』。『說句公道話，嚴家其的確應該公開表態向《人民日報》致謝才對。

第二部份主要是談嚴家其在四月以來學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部份篇幅最長，大旨按照事實撰寫，本來平平無奇。不過，奧妙處卻在接近最後的兩段文字，表面上是搜嚴的罪証，實質上是再一次申述嚴的立場。筆者試引如下：

四月十九日，《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在北京召集一些人物座談，不少人把矛頭直指中央。嚴家其發言說，『對天安門廣場上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無非是要對胡耀邦作出公正的評價，要對一九八六年的某些運動作出公正

的評價』，『在天安門廣場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他不僅畫龍點睛地概括出兩個實質性口號，使之成為動亂初期的行動綱領，並直接為非法遊行叫好，給動亂煽風點火。……

五月十四日，嚴家其同其他十二人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中央公開宣布整個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北高聯」為「合法組織」，威脅黨和政府不得對學生絕食採取強制措施，否則「將成為歷史罪人」。

罵得實在精彩，借嚴家其的口，再一次罵了鎮壓當局為「歷史罪人」。也可以說為嚴家其討公道，說出了當年他對北京戒嚴及其後出現的鎮壓場面，早具先知的觸覺。更有趣的是，作者在此提醒中國的傳播界的同道，大家勿忘當天的熱血沸騰：

這一「呼籲」由嚴家其定稿後，先在天安門廣場宣讀，又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然後在十五日

的〈光明日報〉發表。〈呼籲〉提出的要求，立即變成學生的政治要求。……

五月十六日，他又帶頭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人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並與一些人發表〈五·一六聲明〉，再次要黨和政府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

五月十七日，他又發起和起草〈五·一七宣言〉，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讀到這裡，說文章在罵嚴家其，不若坦白說是

在痛罵鄧小平好了。然而，筆鋒一轉，以下幾段卻是主力聲討李鵬。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正式成立，由包遵信負責統籌。有人說，待全國的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就該由嚴家其負責統籌了。同一天，〈北京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宣言〉複印件即在台灣〈聯合報〉全文發表。〈宣言〉攻擊中央的決策、國務院的戒嚴令為「倒行逆施」，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罷免李鵬案」。當晚他們號召入會者到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並在天安門廣場散發他們編輯的〈新聞快訊〉，咒罵李鵬同志，要把他「押上歷史的斷頭台」。

五月二十六日嚴家其和包遵信在香港報紙發表〈告李鵬書〉，再次揚言要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

來到這裡，〈動亂「精英」嚴家其〉一文要討

伐的是李鵬，這是明顯不過的了。難為這個總理在自己眼皮底下，在光天化日之間被自己的報刊痛罵幾頓，可見當中民憤之深，除此之外，無以宣泄。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日，〈光明日報〉在頭版及第二版大篇幅刊登另一篇「聲討」文章，題為「一部妄圖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綱領——評嚴家其的〈首腦論〉」。這篇文章一如慣例為嚴家其及其著作加上黑標籤，包括「放肆的假科學」、「野心家的世界觀」、「反動綱領」、「反面教材和反面教員」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撇開這些必須的「加黑」過程不論，在「六四」後嚴家其的著作全面遭到封殺的現實下，〈光明日報〉編輯用上一萬一千字的珍貴篇幅濃縮精要地全面介紹嚴家其的思想及主張，的確對延續嚴家其思想，起著難以取代的作用；婉轉地向因「六四」而犧牲了一切報國效忠的學者表達了敬意。順帶一提，平心而論，嚴家其的〈首腦論〉是否出色的作，尚待討論；但難得〈光明日報〉的編輯給予這樣高的評價，嚴家其應感到心滿意足了。

批評萬潤南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光明日報》發文批評萬潤南，題為「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但「聲討」只是應付當權者的手法而已，為六四事件中企業的參與史寫下立碑，才是真章。

萬潤南的得力助手、公司副總裁崔銘山向鬧事的學生頭頭說，「我們幾乎每天都到天安門」，「作為四通公司，我們作出的貢獻，可以說在北京市排在第一位的。我們是冒著整個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險！」……

「四通」的一位副總裁對學潮頭頭透露，「四通」支援了二十多萬元。除了大批直接送到「高自聯」等非法組織的食品、飲料、藥品，還提供了一批供反革命宣傳煽動用的器材，如無線電話、高音喇叭、電講儀等等。天安門廣場「高自聯」指揮中心那部為動亂立下了汗馬功勞的高效率的造謠機器，就是「四通」供給的。

當然，有些「罪名」看起來是真實無誤的，官方媒介的正式寫法大概不應溢出這樣的範圍，例如，文章數出「四通」公司的「抬底下政策」，

「援助」是有條件的。「四通」下邊有個鷺島公司，該公司又下轄一個華成托運服務公司。這個公司的頭頭就曾直接從天安門廣場找來一名「工自聯」常委和幾名鬧事的學生頭頭，當場付給一萬八千元現金，一部無線電話，派給一輛解放牌卡車，並應允代印傳單等等。條件只有一個：支持黨內「改革派」，反對黨內「保守派」，倒李（鵬）保趙（紫陽）。他毫不掩飾地說：「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觀點去影響廣大學生。」

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倒李保趙」是民運界的一般共識，文章作者用了這麼多篇幅，再一次仔細談這問題，就不是純粹追問「萬潤南」及「四通」的立場，而是要自我表態了。如果這一表態不夠清

楚，讀者再看以下兩段自會有同樣結論。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許，萬潤南派人派車直接從天安門廣場召來了首都和外地近八十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靜坐學生頭頭。來到國際飯店彩虹中餐廳之後，萬潤南謝絕了飯店服務人員任何服務，關起門來，以大老板身份揮舞起指揮棒。他首先肯定學生們的行動『已經取得了很大勝利，作出了很大貢獻。』接著打氣說：『如果把你們的行動比作一部作品，那將會是一部傑作。這部傑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經寫完了。如果寫好下篇，寫好結尾，那就更加傑出偉大了。』……

怎樣才能『寫好下篇』？萬潤南出主意說，『你們應該不失時機地撤離廣場，主動地撤回學校，堅持校園鬥爭。』他特別強調：『這樣，就會受到整個社會的讚揚，更有利於下一步的鬥爭。』『下一步』是什麼？他意味深長地說：『你們知道，軍隊進京意味著什麼嗎？如果學

生回學校了，就使得外邊的部隊進京的理由少了一分……（原文所刪）那時候你部隊進來，要幹甚麼？」他亮出底牌說：『撤退，我們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第一條，就是軍隊回去，你們回校；第二條，取消戒嚴，秩序正常；第三條，李鵬下台，鄧小平、楊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榮退休；第四條，擁護趙紫陽同志。』他還特別強調這最後一條『很重要』。

這還了民運學生一個千古公道。至於戒嚴前後黨內及政府內的權力鬥爭，作者也曲筆留下清史。

五月二十日以後，動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們深感從黨內解決問題已經沒有多大可能了，便把希望轉寄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上。嚴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電人大常委會領導人，攻擊國務院按憲法授予的權力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胡說『目前憲法受到極少數人的粗暴踐踏』，因而『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全

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隨即又在香港《明報》上，拋出《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並告李鵬書》一文，叫喊『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文章最後一部有兩段很重要的論述，表面上看去好像是譴責萬潤南違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但實際上是在申述萬潤南的政治理想。

『四通』公司本來是以高科技開發為己任的，萬潤南也借此換來了巨大榮譽。然而，萬潤南本人早就聲明過，他辦『四通』並非著眼科技和經濟，他要搞政治。五月三十日，動亂高潮之際，萬接見香港亞洲電視台記者談話時就明確地說：『政治民主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社會穩定要有一批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云云，正是他們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如何使『中

產階級』大量湧現？萬潤南叛逃國外後，點得更透了，關鍵在解決『產權關係問題』，『就是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必須明確的界定』。說白了，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呼喚資本主義私有制。

要解決所有制問題，用萬潤南自己的話講，『這已經超出經濟改革的領域，變成了一個政治改革的問題。』同時，『活躍的經濟勢力必然會有它的政治代表』。萬潤南除了自己充當這樣的『政治代表』以外，還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探討、推行他的政治主張，這就是由曹思源牽頭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該所從開張之日起，就把引進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和修改憲法作為自己的重要課題。……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該所和《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等單位聯合舉辦了一次『修改憲法理論研討會』，曹思源在開幕詞中就明確提出要把毛澤東、孫中山等人的名字統統從憲法中

勾去，否則他『感到羞愧』。有人則挖苦『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由一個階級、一黨一派、一個人的權力來『決定一切』』。這次會議嚴格謝絕外人進入，然而，英國《衛報》記者還是作了報道說：「這次四小時會議的參加者們要求刪除憲法中任何提及毛澤東思想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文字。」

一個實現私有化，讓一批所謂「中產階級」佔主導地位；一個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實現所謂「議會民主」——這就是萬潤南所夢寐以求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這，當然是一枕黃粱。

除去了最後的一句話，則整篇可以算是萬潤南的革新大憲章，以日後中國政府兩次憲法修改以適應國家發展的實況及需要，不能不說萬潤南早在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捨身（身家）貢獻國家，《光明日報》也義不容辭的幫了一把。

借鄧小平批鄧小平

另外，《人民日報》於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隆重公佈：「《鄧小平文選》出版發行」（見同日頭版頭條的標題），而該報的編輯亦無心借此良機，一泄心中的不滿。同日第二版的頭條文章為「鄧小平文選」（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重要文章介紹，列舉多二十多篇文章的綱要，其中最有趣的是收納了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鄧小平在西安所發表的《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一文，其介紹如下：

《共產黨要接受監督》也是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在西安幹部會上所作報告的一部分。文中指出，『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我們大量的幹部居於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

假如這還不足夠的話，則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登《共產黨要接受監督》，就清楚表明了編輯中人對「六四」鎮壓的不滿了。

所謂監督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黨的監督。對於共產黨員來說，黨的監督是最直接的。要求黨的生活嚴一些，團的生活也嚴一些，也就是說，黨對黨員的監督要嚴格一些，團對團員的監督要嚴格一些。第二，是群眾的監督。要擴大群眾對黨的監督，對黨員的監督。第三，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監督。要擴大他們對共產黨的監督，對共產黨員的監督。

《人民日報》的編輯特別選用這篇文章，在「六四」後一片黨要監督全國的氣氛中，特別顯得有意思。另一方面，《人民日報》的編輯亦似乎有意借用這篇文章，為「六四」的不幸衝突作一解說。文中鄧小平說到，

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註四）嗎？有些青年總覺得大民主解決問題。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沒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來大民主。群眾有氣就要出，我們的辦法就是使群眾有出氣的地方，有說話的地方，有申訴的地方。群眾的意見，不外是幾種情況，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對，不做就是官僚主義。有一部份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辦不到的要解釋。有一部份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進行說服。總之，要讓群眾能經常表達自己的意見。

單看這一段文字，似乎只是鄧小平對黨內「民主集中」理念作一種變通的解釋而已。然而，編輯在註釋四卻借毛澤東的口去推介民主理念，讀者試看其寫法：

「4」「大民主」、「小民主」是一種諷刺性的

用語，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曾加以援引和解釋。他批評一種人主張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要在中國實行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觀點。同時講話中也用大民主來表示大規模的風潮和鬧事。下面所說的「要有小民主」，是指認真執行我國憲法所規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和其他民主權利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

在黨定性為「風潮和鬧事」之後，《人民日報》的編輯仍不忘提醒當權者有責任要「使人民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和其他民主權利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這才是編輯要說的話。

結論

當然，在「六四」後的官方傳媒當中，要打上旗號為「民運思想家」及「社會改革者」平反的，

確沒有甚麼空間；官方傳媒中一片聲討民運人士的聲音，但這聲音背後，卻有精彩的文章；借在批評這幾位民運人思想家的旗幟，反過來為民運人士打氣，以至全面推介他們的思想及理念，完全符合辯証法的「正反合」規律。

讀過這一系列的文章，讀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聞業應有更深一層認識，絕對不可單純視他們為黨的機關喉舌。針對這幾篇文章而言，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特別加以注意：

(一)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作者只是歪打正著，並非立意為民運人士發聲。筆者也得承認，並沒有任何內幕線人提供內幕消息。這一切的推論，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直覺反應而已。

然而，無論該等報刊工作人員的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結果卻是：對鎮壓民運的當權者一點幫助也沒有，但卻為保存及推廣民運人士的思想，產生鉅大作用。

(二) 在四篇文章中，「罷免李鵬」是一切的

主線。前後共出現十多次。文章作者普遍對共產黨及鄧小平都懷有期望，但對李鵬似乎是恨之入骨。以其後的發展而言，這種心態著實對中國政壇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李鵬」的評價，似乎已有明顯共識。

(三) 另一個主題是「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這一主題一直影響著中共的修憲及修改黨章工作。憲法要修正，黨章也要修正，但誰也不敢冒險提出，於是借已經出走的民運人士之口，轉過彎來刺激討論，也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最後，為甚麼這些文章可以輕鬆過關？原因錯綜複雜，由於事隔二十年，謎底可能永遠弄不清。在眾多可能的原因之中，也許是「老爺子心態」在作怪。不難想像，也許老革命一輩心中也認同中國要改革，但口中就說不出，因為年青一輩一說之後，就覺得是人家是要作反了。所以，為這些「老爺子」來說，改革可以做，但不可談。

「老爺子」心態當然不值得鼓勵，在人人平等

的大原則下，為甚麼統治階層可以視自己為老爺子，要當別人是孫子。但上層的老爺子心態值得注意。這種曲筆救國的聲音之所以得到默許，與這種心態有很大關係。對在國內從事新聞事業的前輩及同道，筆者一直懷有極大的同情，他們滿有報國的熱誠，但又對現實的政治制度不得不予以一定的妥協，似乎他們都認同在目前的體制下，為國家做一點事的空間依然是存在的。

了解到他們的心懷，就更容易了解二十年前「六四」前夕香港親祖國的老報人所寫出「痛心疾首」四字的沉重，而他們在所屬報刊的頭版「開天窗」，亦絕非偶然。

總結一句：筆者對中國新聞業永遠懷有信心和期望。

□